往事鈎沉

悼亡友

李杭育

那天上午，好友葉芳發來短信：陳文育去世了。你保重！

陳文育是我們的大學同學，溫州人。他比我大一歲，在杭大中文系七七級同學中，我倆被並稱「二育」——一對桀驁不馴的怪物。

晚上，我十天前開始畫的一幅畫，大局已定，非常出彩。我要喝兩口，犒勞犒勞自己。

來到酒吧，我一坐下，一吧女就醉醺醺過來打招呼。我跟她講，你今晚不要煩我，我要想點事情。

我在想陳文育的事。當年，他可算得上是我們同學中最有才華的人物之一，也是和我關係最密切的同學之一。畢業後，他回到溫州，他的人生道路就開始了另一種走向。他越來越遠離文學和人文思想，越來越陷於當年盛行的迷信的包圍。他的病，原爲腦血管某處有個什麼東西壓迫神經，造成他面部時常抽搐。但在一年多的時間裡，他沒有去醫院看病，而是由他那時的妻子請來一位「大師」，先對他說病，再賣給他一塊「神石」，每天佩在胸前。

這位「大師」我見過，東北女人。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，文育在杭州安家，把房子特意買在我那時居住的城西南都花園。他們夫婦把那女人請到家裡住了一些日子，臨了還給了她好幾萬酬金。錢倒還是小事情，大問題是他的病耽擱了治療。

文育後來去北京出差，腦血管破裂，幾乎丟了命。那以後，他就落下了半身癱瘓。再後來，老婆和他離了婚，他只能僱個保姆照顧自己。天長日久他和保姆有了感情，索性又娶了那女子。

大約三年前，文育獨自來杭州治病，住在西溪路上的一家診所。他來電話說想見我，並叮囑我帶點茶葉給他。我去了，是個夜晚，和他聊了三個鐘頭，聽他跟我講他想寫小說的許多想法，並向他提供了一些意見。不久，在一個下午，我又去看過他，帶去一些水果，但沒有坐多久。那是我最後一次和他相見。

一個智商很高，畢業於大學中文系，精通德國古典哲學（尤其是黑格爾），多才多藝的現代知識分子，竟然被那麼老套的中國式迷信所誤，家破人亡。

想起文育的事，我不僅傷感，更是憤怒！

可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祈願我這位老同學的在天之靈安詳、和順。我將記住你青春時代那極具感染力的朗朗笑聲。

此岸

陳志宏

我所生活的內地城市，曾被某著名文化學者如此定性——是我所到過的省會中，算是不太好玩的地方。

一句話讓這座城市鬱悶了很多年，斯人斯地爲此耿耿於懷，憂憤難當。

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一日，這個被冠以小光棍節的日子，「奶茶」劉若英在自己的微博裡晒出了一組「微服私訪」照。她素面朝天，開心連連，文字裡透着甜馨氣息——「在南昌，一早一個人跑出去溜達。走累了，跳上公交車。車上好乾淨，街上的小吃也好吃。耳機裡是巴黎限量版的音樂，我喜歡這樣的生活……」

明星劉若英，喜歡南昌的生活！

而我在此傾情生活十六載，亦未見喜。正可謂，此岸人無心，彼岸人有情呢。

我的不喜，只因我身在此岸（熱鬧省會），而心在彼岸（泥土故鄉）；而劉若英的喜，是她身在鎂光燈頻閃的娛樂圈（此岸），卻心繫無羈隨意的自由生活（彼岸）。

人的心思，微妙得很，總覺得自己身處的此岸不如別人生活的彼岸。此非而彼是，薄彼而厚此。俗話說的「端在碗裡，看着鍋裡」，「近處無風景」以及「這山望得那山高」等與此理相通。

前述那位文化學者，他一直生活在上海，屐痕處處，閱盡海內外城鄉風情。之所以非議南昌，只因他不以此爲彼岸，他的彼岸在文化，抑或說是文化散文。南昌雖是歷史文化名城，但現實很不文化，這點恐怕沒什麼爭議。

人在此岸，心戀彼岸，莫不如是吧。

燈下集

我與匯智

王　璞

回想起來，第一次聽說匯智出版公司是九年前的往事了。一天，同事陳德錦突然來敲我辦公室的門，問我有沒有興趣將近來的散文結集出版。

「當然有啦！」我不假思索地道。寫作人誰不想出書呀，何況那時人在江湖，年年都有出版與學術研究的考核壓力。散文著作雖不算學術成績，好歹也可妝點一下那份要命的年度考核報表啦。

「那好，有間出版社可以幫你。」德錦面無表情地道。

那時我與德錦同事已達十二年，並曾合作教過同一門課，但我倆都是性格內向、不善言辭不善交往的人，雖然我對他的人品文章一向景慕，我們的辦公室又是緊鄰，但關係眞可以算是「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來往」那種。印象中，那是他第一次到我辦公室敲門。第一次敲門就送來一隻大餡餅，世上竟有這等好事？所以我半天才反應過來，驚問：「那是間什麼出版社？」

「匯智出版公司。」德錦依然不動聲色道，「負責人羅國洪是我浸會同學，他好鍾意文學的，搞了好多年文學出版，現在正想搞個香港作家散文系列，你如果有意，可以參加。」

這就是我在匯智出版的第一本書，散文集《小屋大夢》，於當年——二〇〇五年出版。

從此我與匯智出版，確切地說，是與羅國洪先生結下了不解之緣。正如當年文學發燒友提起青文書屋就會想到羅志華，如今，人們提起匯智出版就會想到羅國洪。在香港，一間出版社往往只是一個人的頑強堅持，尤其是文學類的出版社，那是商業大潮中的一葉孤舟，要在茫茫商海的驚濤駭浪中衝浪、搏擊、求生，眞要有少年派那樣頑強的意志和大無畏精神才行。不，比少年派更加的英勇卓絕，因爲少年派是被置於死地而後生，而文學出版社的出版者是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」，其中的艱難險阻，豈一次「奇幻漫遊」了得。

因文字所限，這裡我只想簡單談談我在匯智出版四本書的經過，希望藉此表達我對匯智出版公司、亦即羅國洪先生的敬意於萬一。

如果說，上述《小屋大夢》的出版，還應感激香港藝展局資助的話，我在匯智出版的第二本書《怎樣寫小說》得以出版，就完全是羅國洪一力鼓動、策劃和實施的結果。我雖寫作小說多年，對小說鑒賞和寫作有些心得，在大學教書時卻從未有機會教小說，自然更沒想過要出版小說寫作方面的書。二〇〇六年初，正當我爲《小屋大夢》的銷售情況忐忑不安時，一天，羅國洪突然發來電郵，問我有沒有興趣寫一本有關小說寫作的書。看到那封信時，我心中的第一反應是驚喜：天吶！簡直問到我心窩裡去了！事實上，這本書早就在我的心裡，但我從未想到能夠將它變成一本眞正的書。不過激動過後，緊接着我就想到，藝展局剛資助我出版了《小屋大夢》，要他們再資助我出版一本新書幾無可能。誰知羅國洪接着便道：這回我們不找藝展局資助了，自己投資來出。

「啊！虧了怎麼辦？」我問。

「虧就虧，」羅國洪道，「我相信這本書對愛好文學的青年有用。你寫作時只要盡力把握好這個讀者定位就行了。」

如果說，《怎樣寫小說》這本書還有一點商業運作的成分、幸運險勝的話，那麼我在匯智出版的第三本書《家事》和第四本書《貓部落》，對羅國洪來說，就完全是一種文學敢死隊行爲了。這種純文學的長篇小說，別說在香港了，即便是在文學讀者群較衆的內地，銷路也肯定是慘淡的，但羅國洪一聽我提出要求，便立即與我簽定了顯然有利於我、不利於他的出版合約。並一如繼往，爲出版和發行這兩本虧本書稿全力投入。我相信我一定是他最麻煩的作者了，就不提在書籍公關方面的不合作態度了，因那時我已辭職移居內地，給我們之間的溝通帶來很大不便，兩本書的編排與校改，都只能通過電郵來進行，但羅國洪不厭其煩，一次次徵求我對封面設計和編排的意見，一定要讓我滿意爲止。尤其令我感佩的是他在校改中那種精益求精的態度，簡直達到吹毛求疵的地步，到後來我自己都不耐煩地說「行了行了，」他仍一次次來郵提出問題和意見，對書稿的那種認眞的勁頭，往往令我想起我一位小學老師，她對班上孩子的關愛呵護，勝過了孩子的親爹親媽。

我是幸運的，因爲我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路途上從不孤獨，不斷地有像陳德錦、羅國洪這樣的好夥伴扶持着我，支持着我，讓我搭上他們的小船，乘風破浪，一路前行。

自由談

稱謂的改變

郭慶晨

曾寫過一篇《「官陞脾氣長」之類》的小文，說到有些人陞官之後長的不光是脾氣，還有別的什麼，其中包括輩分。現在想來，很有必要專門說一說官陞輩分長的事情。有些人，在尚不得志時，眼睛總是朝上看，見人都要矮一輩。可一旦位高了、權重了，眼睛就開始往下看，輩分也跟着長起來。在這方面，曾經當過竊國大盜的袁世凱就是較爲典型的代表。

袁世凱年輕時，曾與張謇同在吳長慶幕下爲官。張謇是清末的狀元，很有些名氣。袁世凱初見張謇時，曾以弟子禮相謁，來往通信皆以「夫子大人」相稱；自從擔任山東巡撫後，再寫信，稱呼就改了，不再是「夫子大人」之類，而是「季直先生閣下」；待到陞任直隸總督，又由「季直先生閣下」改稱爲「季直我兄」。從「大人」到「先生」再到「我兄」，儘管是羞羞答答、扭扭捏捏，但還是把輩分長了上去。按說，輩分是固定不變的，孫輩就是孫輩，爺輩就是爺輩，既不會長也不會矬。可袁世凱爲什麼會長了輩分呢？無他，只是因爲陞官了。張謇是個有學問又有幾分詼諧的學者，他在給袁世凱的信中不無諷刺地寫道：「夫子尊稱不敢，先生之謂不必，我兄之稱不像。」揭穿了袁世凱早先對自己在稱呼上的虛僞。

那個曾經寫過《憫農》詩的唐代李紳，官運不濟時，曾在一個叫李元將的人家裡寄居，並稱其爲叔。後來，李紳當了大官，不滿意李元將仍管他叫侄兒，李元將知趣，便以兄相稱，李紳仍不高興，李元將再改爲以侄自稱，反過來管李紳叫起叔叔來，可李紳還是不悅。無奈之下，李元將不得不以孫輩自稱，管李紳叫爺爺，李紳方才勉強相容。寄人籬下時是侄子，一步升天後就變成了爺爺。輩兒之得夠快的了。

在改變稱謂上，還有一個情節讓我難忘，那就是《紅樓夢》裡元妃省親中元妃與父母相見那一段。元妃省親的禮儀結束後進入內宅與父母相見。賈政和王夫人兩人要先給元妃行禮，要直挺挺地跪下，然後一口一個「貴妃」地叫着，說貴妃怎麼好，怎麼洪福齊天，不要以我們的身體爲念，要專心伺候好皇帝。本來是該叫女兒元春的，如今卻要叫「元妃娘娘」；本來是女兒應該跪父母的，如今卻要父母跪女兒。這種變化，雖然不是個人的初衷，但卻體現了皇權和封建等級制度的威嚴。父母見了女兒要下跪，要稱「貴妃娘娘」，還不是因爲女兒嫁給了皇上！成了貴妃，也就不再是女兒——沾了皇上的光，長輩了。這，也算是官陞輩分長的延伸吧。

稱謂的改變，源於地位的改變，而地位的變化皆由官位來決定。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「官本位」的厲害。魯迅的「人一闊，臉就變」，說的就是官本位給人帶來的這種變化——當官了，陞官了，貴顯了，人的臉色立馬就變了。當然了，臉色的變化只是心態變化的反映。他心裡在想：我當官了、陞官了，終於可以高高在上，做人上之人了。如此一來，如何不給自己長輩分，讓別人降輩分！

細細想來，官陞輩分長，實在是一種悲哀，人格的悲哀！

春之閃回三號（攝影）　丁　建

人與事

雕刻人生

瀟　然

天天跟火打交道，燒磚燒到走火入魔的張彥，眼睛也燒壞了，視力退化得厲害。他仍然不願放棄，去拜訪各地的燒磚師傅，河南、安徽、山東、河北、山西，拿着酒，包車去山林深處拜訪，所有人都說沒燒過小磚小瓦，肯定都會化的。「我就不信，開始了就不能停下來。」憋着股勁兒的張彥去國家圖書館、首都圖書館找古代燒陶的書籍，仍是毫無所獲，「後來眞的燒出來一塊，總算看到希望。」

在一批又一批燒壞了的坯子中，張彥終於找到了一塊完整的小瓦，很久沒有睡過好覺的他，手裡捏着它沉沉睡去。「吃飯也不吃，叫也叫不醒，睡也睡不死，妻子時不時過來摸摸有沒有氣兒，等醒來，發現瓦不見了，又開始着急，妻子說擱窗台上呢，我再看，才起來好好吃飯，琢磨怎麼燒出來，知道有希望，總會燒出來。」

失敗、總結，再失敗、再總結，如此反覆，張彥終於燒出來眞正的小瓦，「感覺的是一種喜悅」。過完水晾在陽光下曬乾之後，他把小瓦往上拋出揚起來，聽嘩啦啦跟瓜子兒一樣的清脆聲音，興奮之餘，也感嘆成功來得太晚了，「那是二〇〇二年，折騰了這麼多年，可惜老爺子沒能看到。」

後來，張彥又研究營造技術，「用大磚塊砌起建築來，比較容易，小磚會變形，後來明白了工藝的要點，需要水的氧化還原。」這才塡補了微型古建築的空白。

傳承

創新技藝的張彥，打破了傳內不傳外的規矩，帶徒傳藝。他選徒弟的標準，第一要喜歡磚雕藝術，第二要能坐得住，耐得了寂寞。

「我們這裡條件不是很好，活兒也很髒，不過喜歡了就不枯燥。徒弟們來自全國各地，有學了兩個月就半途走了的，雕得四不像；也有帶了七八年的，很認眞忘我。喜歡做和被動去做是不一樣的。」

張彥說，過去的「口傳心授」，好像很保守，其實不是，「傳承本身就是文化，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並不知道什麼是傳承。不稱職的師父會把孩子耽誤，因爲爲人的品德直接影響着徒弟，一個眼神、一個動作、一起生活，都是傳承。我跟徒弟們溝通，一比劃，孩子們都明白了，磨合得相當默契。他下手教別人，也這麼教，這過程最是巧妙。」

在大機器批量化生產的時代，張彥始終堅持着手工作業的生產性保護。「所謂生產性保護，是指做出來的東西可以應用到實際生活中，但並不是粗製濫造，製作的過程，要遵從傳統的技法，這才是良性的發展，才能做出來精品。產權保護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也要保護品質。」

雖然身處遠離京城的郊區，還是有人絡繹而來，求購「正根兒」的北京磚雕。「有人已經等了兩年，但我們不會因爲急着需要就粗製濫造。」張彥介紹，他們也有結合機器的技法創新，譬如用機器來操作簡單的雕刻工作，但是出型還是純手工製作，「傳統的東西要傳承，關鍵的是不變味兒。」

張彥說，效率提高的前提，是保持京派的風格和手法不變。他把北京磚雕定位爲藝術商品，不光保留了文化，品質也保留了，「我們不會便宜點去做，也不追逐利潤，價格能維持基本的運作就可以了。」現在的張彥，總覺得時間不夠，他想趁着眼睛還好，多帶一些徒弟，把磚雕的文化產業做好。「不光是商品，要把文化做出來。很可能有一天我把磚雕搬上舞台，做舞蹈，這是很大的創意。通過舞台舞蹈的藝術語言，來詮釋磚雕的文化。」

（下）

學習「慈善」

流　沙

福耀集團的曹德旺被網友稱爲「中國首善」，去年他股捐三十五億元，成立河仁慈善基金會。

有人問曹德旺，一個人該如何才能走向「慈善」？曹德旺說了一個故事，一九八三年，他處在創業階段，口袋裡沒有多少錢。但一天，他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師找到他，希望他能給學校捐點錢，購置一些課桌椅。曹德旺一口應承下來，向朋友借了二千元捐給了學校。

曹德旺說，這是他第一次做慈善，是情義上的「不得不做」，也是老師對孩子的關愛讓他「感同身受」，讓他「沒法不做」。他說，慈善這件事，最初是人的一種本性，但眞正投身慈善，靠本性是不夠的，還需要「學習」，從受益人身上學習，從別人身上學習，從做慈善這件事本身上學習，「學習」可以讓自己擁有堅定的慈善之心。

香港影星成龍曾說過他最初的「慈善之路」。成龍在香港剛紅的時候，有人請他參加公益慈善活動，成龍當時拍片多，應酬多，根本無暇顧及慈善這件事。成龍總是說，他沒有時間去。於是助手便游說他：「你不需要做什麼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你出席一下，這樣對你和你的電影都有好處。」

成龍於是答應了，抽出時間去看望殘障兒童，助理們把禮物分發給孩子，然後說：「成龍非常難得，但他今天還是抽出時間看望你們，還帶來了禮物。」事實上，成龍並不是自願來看望殘障兒童，也不知道這些禮物是什麼。於是，成龍就感到了不安，覺得自己騙了這些可憐的孩子。後來成龍就不允許再這樣做，成龍對於「慈善」的理解，就是從這樣的小事中，一步步地被教育着，一步步從「被動的慈善」中學習，最終成爲自覺的「慈善」，成爲一位公益慈善大使。

慈善需要學習，學習可以開啓慈善。

人生在線

配豬

陳魯民

我在內地大學當教授，看起來西裝革履，文質彬彬，但沒幾個人知道，早年我曾經餵過豬。那是一九七二年，我是個只有一年軍齡的新兵，被調進炊事班燒火兼養豬。我很高興，因爲當時部隊有個不成文規矩，凡是表現好的、有發展前途的兵，都要到炊事班、農場等艱苦地方鍛煉，而且，剛剛學過被中央軍委授予模範飼養員稱號的葉洪海的事跡，他就是養豬出的名，受到毛澤東主席十一次接見，榮立一等功，周恩來還點名派他到阿爾巴尼亞等國傳授飼料製作技術。

我餵豬雖沒經驗，但盡心負責，不怕辛苦，豬長得膘肥體壯，連長還表揚過我幾次。但沒想到，這時候麻煩來了。有一頭母豬哼哼了兩天，不怎麼吃食，急躁不安，耳朵直立，咬圈欄杆，我還以爲牠有病了，就到附近的獸醫站去問，人家說，沒病，發情了。回來後，我還沒來得及帶牠去配種，牠就撞斷了豬欄裡拳頭粗的木欄杆，自己跑出去。連裡派人找了幾天，也沒下落，正準備給團後勤處寫報告，那頭母豬自己回來了。幾個月後，母豬生了一窩十二隻小豬仔，奇怪的是，嘴是尖的，背部布滿花紋，老班長說，這像野豬，恐怕是與野豬交配的種。這群雜交豬仔，能吃能鬧，特別皮實，奔跑跳躍能力特強。我們雖然加高了欄杆，但牠們還是能輕鬆跳出，好在並不跑遠，自己會回來。有經驗的老鄉告訴我，這種雜交豬養不長，再大一點就會跑到山裡不會來了。我們趕忙把這群豬送的送，殺的殺，處理得一隻也不剩。我還記得，雜交豬肉味有點酸，草腥味很重，就這也一點沒剩下。

與我們一山之隔，有個女兵中隊，一百多號女兵，只有中隊長、司務長是男的。她們大都來自北京、武漢，幾乎全是幹部子女，那年頭，老百姓孩子很少有能當上女兵的。養豬這活自然也是女兵來幹，平時餵養倒不難，只要上心就成，但有兩件事比較麻煩，一是配種。配種時，怕那些十七八歲的女兵臉皮薄，每次都是司務長拿着小棍趕着發情的母豬到外邊去配種，後來，女兵們也習慣了，大大方方地帶母豬去配種。二是殺豬。過去，都是請兄弟連隊戰士來幫忙殺豬，挺麻煩的。後來，一個姓楊的炊事班長，性格倔強，身高力壯，就看了幾回，居然學會了殺豬，以後，不僅她們自己的豬由她主刀，男兵連和老鄉也有請她出手幫忙的。她因此被評爲學毛著積極分子，樹爲軍區標兵，還到處去做報告，出席軍區黨代會，被提爲司務長，多年後，在省軍區後勤部副部長位置上退休。

那時，各個連隊都養豬，一方面是爲了吃肉，另一方面，豬養得好壞，也是評先進連隊的重要指標。一般來說，豬養個年把，長成一百五六十斤，宰殺最划算；再養，雖然也能繼續長，但費的飼料多，長肉也慢；養過三年，那肉就很難吃了，嚼不動，煮不爛。團部警通連養了頭約克夏公豬，身高體壯，白白胖胖，很喜歡人，連續爲連隊評先進連隊掙分，被戲稱「功勳豬」。連裡不捨得殺，三年功夫長到五百多斤，在團裡都掛了號，後勤處長指示，這頭豬不能隨便動，要殺得我批准。就這樣，這頭豬最後足足長到一千餘斤，首長下來視察，兄弟部隊來訪，都要帶來參觀。軍區《戰鬥報》還拍了照片，發在報紙上。這下子名聲在外了，附近的連隊和老鄉都來配豬。那時不興收錢，兄弟連隊的帶上幾十斤飼料，說是給豬補補營養，老鄉帶的東西咱又不能收，還得管他一頓飯。幾年下來，估計方圓幾十里的豬都是牠的後代，可謂子孫滿堂了。後來，這頭豬無疾而終，光豬油就煉了滿滿一缸，讓全連吃了一年。